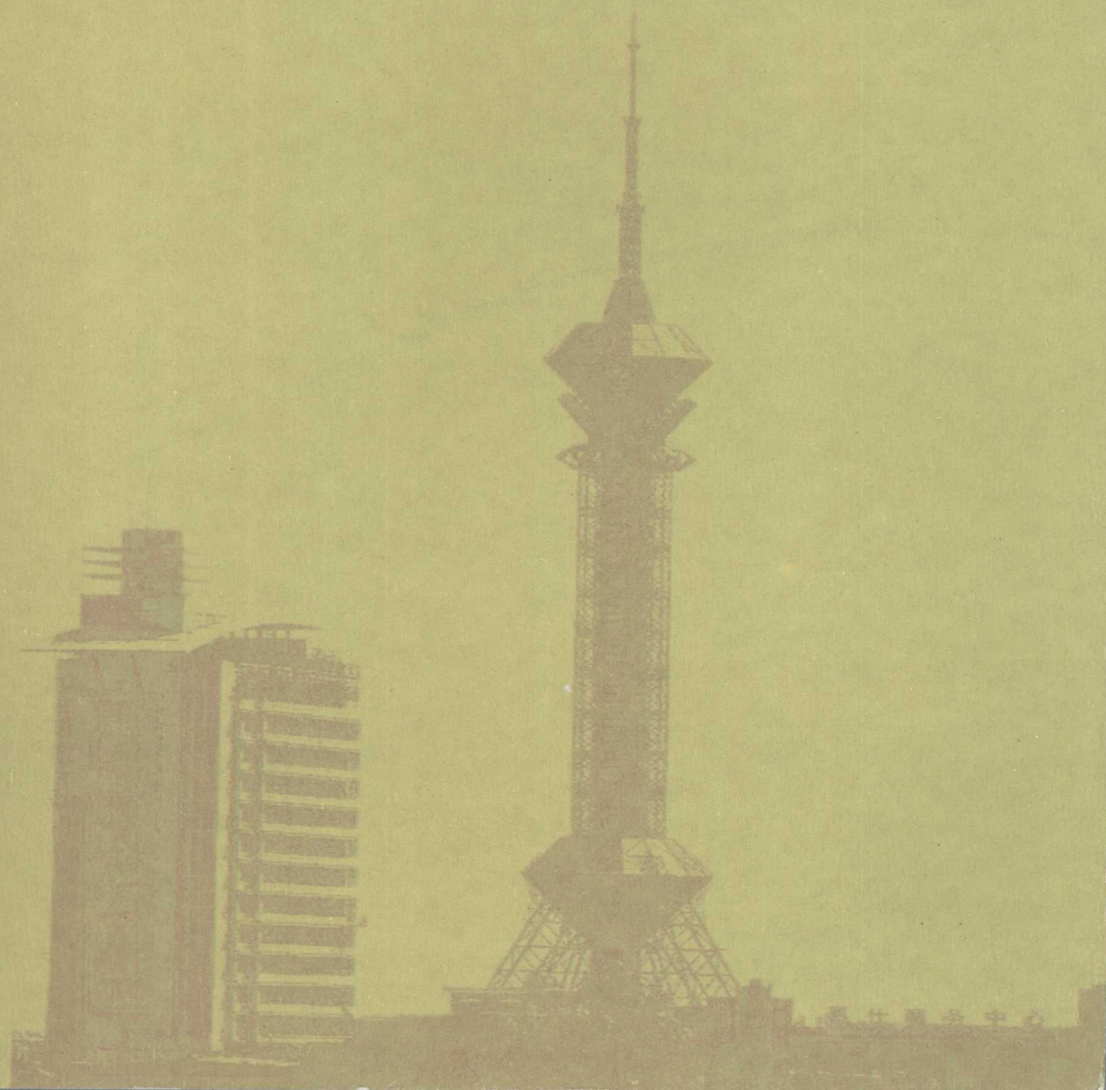


SHIJIAZHUANG LISHI MINGREN

当代卷

石家庄

历史名人



河北人民出版社

SHIJIAZHUANG LISHI MINGREN

石家庄

历史名人

当代卷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河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中国一代名医郭可明	郭纪生 郭元(1)
一代画坛宗师赵望云	张诚 王胜利(19)
京剧大师奚啸伯	陈平(36)
国家名校的奠基人陈挹芬	杨增杰 王胜利(60)
舍身抢救落水儿童的英雄王德恒 ...	张志欣 芮仕杰(76)
运筹经济的先行者刘礼欣	刘矿军(93)
国际著名眼科专家张晓楼	何玉 栗牌(102)
新中国兴修水利的先驱王华棠	赵志勇(120)
著名作家贾大山	王志敏(133)
革命文学大家方纪	崇厚 王胜利(148)

中国一代名医郭可明

郭纪生 郭元

郭可明(1902—1968),字大德,河北省正定县东仰陵村人。郭可明是我国著名中医学家、瘟病学家,河北省当代十大名人之首。他自幼学习中医,终生热爱中医事业,医风严谨,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一心赴救病患,是一位深受人民爱戴的好医生。他爱党爱国爱人民,积极培养后人,将毕生积累的临床实践经验毫无保留的传授给学生,为我国中医事业的发展奉献了全部精力。

郭可明曾担任过很多重要的职务,如石门(石家庄市旧称)医士公会会长、石家庄联合中医院医务主任、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石家庄传染病医院主治医师等,他曾当选石家庄科学技术协会委员、石家庄医药学会副理事长、中医学会主任、河北省医学科学研究院特邀情报员,曾为石家庄政协常务委员、河北省政协委员。



郭可明(1902—1968)

1954年到1956年,郭可明因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取得辉煌成就,获得卫生部甲等奖,并于1956年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虽然郭可明去世已将近40年,但他在中医领域中的突出贡献和卓越成就,以及为人医的崇高品质依然浩气长存,风骨永在,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

领袖接见名中医 辉煌瞬间永难忘

1956年3月5日下午7点。伴着初春的微风,此刻的北京已

是华灯初上，这美丽宁静的夜晚也掩盖不住勃勃的春意，阵阵春风似乎在传递着喜悦的讯息，仿佛预示着有什么不平凡的事情即将发生。

中南海怀仁堂宴会厅里灯火辉煌，正在出席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的部分代表来到这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事情。此时大家正聚在一起好奇地议论着：那么多政协委员，为什么偏偏是我们被召集在这里呢？会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吗？听说国家领导人要来接见我们，是真的吗？会是哪位领导人来接见我们呢？一连串的问题浮现在委员们的脑海中。很多人在兴奋、期待和不安的情绪中焦急地等待着。

宴会即将开始。有工作人员进来问道：“请问，哪位是郭可明大夫？”郭可明连忙站起身来，应声回答：“我就是。”“噢，您请

坐。”工作人员问明情况后马上又转身离去。这令郭可明感到非常奇怪：这么多人都问，为什么要单单问我呢？正在这时，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同志进来对郭可明说：“郭大夫，你知道吗，毛主席和周总理马上就要来接见你们了！”听到李部长这么说，郭可明心情非常激动，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真的吗？毛主席、周总理要来接见我们，这是多么大的光荣啊！



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与郭可明亲切握手

正在郭可明紧张思索间，只见毛泽东主席那高大威武的身姿已经出现在宴会

厅门口，身后还有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转眼间毛主席、周总理已经健步走进了会场并亲切地和在场的委员们一一握手交谈。

很快毛主席来到郭可明的面前。李德全同志向主席介绍说：“这位就是石家庄的郭可明大夫，苏联专家的乙脑就是他治好的。”主席那温暖的大手紧紧握住郭可明的手，用浓重的湖南话说道：“了不起，了不起啊！”郭可明用双手紧紧握着主席宽厚的大手，抑制住内心无比激动的心情，赶忙回答说：“这都是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站在旁边的新华社摄影师马上用相机抢拍下了这珍贵的瞬间。

毛主席亲切接见中医专家郭可明的照片作为宝贵的历史资料，至今保存在新华社的档案库中。它见证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医事业的肯定、关爱与支持。郭可明也有幸成为毛泽东主席接见过并握手合影留念的唯一一位中医专家！这不仅仅是郭可明个人的荣誉，也是石家庄的光荣，是河北省乃至全国中医工作者的光荣！

郭可明怎么会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呢？为什么他会成为这辉煌历史瞬间的主人公呢？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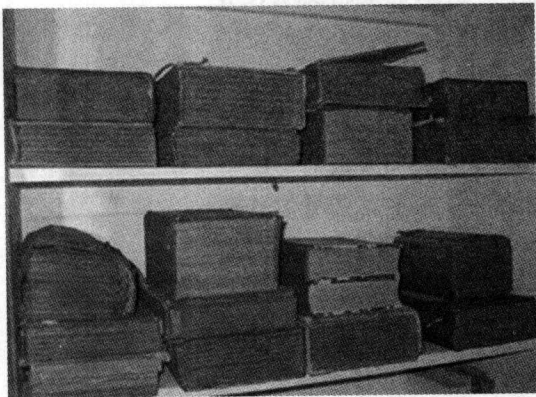
承家学初涉杏林 学海无涯苦作舟

郭可明出生于中医世家，继承祖业，走上了中医的道路。

最早在清咸丰年间，郭可明的祖父郭辰魁就在正定府（即现在的正定县）东仰陵村开设门诊，以内科和妇科尤为专长。郭可明的父亲郭达谐除了继承中医内科疑难病症治疗之外，又对中医外科多有发挥，善用“蜀漆”治疗淋巴结核，疗效神奇，十里八乡求医问药者颇多。郭可明是郭达谐的第四子，自幼聪明好学，是郭氏中医世家的第三代传人。父亲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继承家学，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郭可明6岁就入私塾，15岁正式开始跟随父亲学医。父亲对他的要求很严格，虽说是儿子，但也要和其他学徒一样从最基本的拿药开始，经过认药、拿药的锻炼，慢慢才能够帮助父亲调配丸药，这样的活儿一干就是好几年。他不怕吃苦，不分寒暑，每天天蒙蒙亮就起床，筛药认药，勤恳工作；到了晚上点着油灯，一边推着药碾子轧药，一边借着昏暗的灯光看书学习，常常学习到深夜。天天如此，从不敢懈怠。郭可明熟读过许多部中医经典，像《本草经》、《本草纲目》等中药的经典著作，他

更是达到章章能熟练背诵的程度。

每天读书，刻苦学习，认真研读的习惯他保持了一辈子，直到了花甲之年仍时常读书到深夜才休息。他读书读得很精细，在反复诵读中连边角的批文注释都不放过。



郭可明经常阅读的医学书籍

说到这里，还有个有趣的小故事呢。

枣仁是一味常用中药，中医都知道枣仁能治疗失眠，中国古典医籍《冯氏锦中》、《嵩崖尊生》和《石室秘录》都对枣仁治疗失眠的性能及使用方法有论述，可以说他们各有侧重，诸家有长。但都提到：枣仁需要生炒各一半，就是将枣仁的一半用温火炒熟，再配上一半生的入药。

郭可明有段时间在使用枣仁治疗失眠症时，患者反映疗效不够明显。

郭可明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又如何提高疗效呢？”他是一个从不放过问题的人，尤其是在临床过程中，他总是经常说：带着问题给患者看病，就是对患者的不负责任。

忙累了一天，夜深人静，全家人都睡了，可他还在翻阅资料。问题盘旋在脑海，郭可明冥思苦想。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深夜两点多钟，他有些倦意了，于是自言自语：“再看最后一页就睡觉吧，明天再接着查。”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炒枣仁隔宿香味走窜，服之无效。”他恍然大悟：“明白了，原来是因为枣仁炒过后不能隔得时间过长，长了就没有香味了，疗效也就没有了。有道理。”从此，郭可明用枣仁治失眠总能得心应手，药到病除。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许多人都知道郭可明用药如神，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神剂妙方后面的辛酸和苦累。勤奋，就是他几十年行医生涯用药确有独到之处，总有精妙之笔的原因。

学徒的日子总是单调的，而小孩子又总是淘气而充满着好奇

的，郭可明也不例外。他曾经对孩子们讲过自己的一个小故事：为了让我一心学医，心无杂念，父亲绝不允许看任何与医学无关的“杂书”。禁不住好奇心的诱惑，有一次我背着父亲偷偷借了些小伙伴的小说演义类的故事书来看，结果还是不小心被父亲发现了。父亲拿起书就要烧掉，我苦苦地哀求他，说这书是我借来的，以后再不敢了。父亲却毫不留情面，严厉的教训了我，说是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这次不记住难保以后还会再犯！最后还是把书都烧掉了。从此之后我一心只读医书再不敢分心了。

的确，父亲对郭可明家教很严，甚至近乎于苛刻。父亲要求他在待人接物、生活作风方面要谦虚恭让，自律谨慎。家里来了客人，父亲陪客人坐着说话，郭可明就要规规矩矩地站立在一旁随时准备给客人斟茶倒水；出门在外必须按时赶回家，不能在外随意流连太久而耽误学习时间。一次，在很冷的冬天，快到过年的时候，父亲要郭可明出去收账，人家热情挽留他吃晚饭，他执拗不过只好答应。用罢晚饭，一看钟表，糟糕，耽误了回家的时间。郭可明立马顶着风雪急急忙忙往家赶。可是等他跑到家时发现大门紧闭，原来父亲为了惩戒他，故意命令别人关上了大门。任他怎么叫父亲就是不给开门，无奈只好在门口冻了一夜。

郭可明晚年曾回忆起少年的生活和学医的往事，他说：“虽然我父亲是旧式的教育，古板而严厉，于现在来说已经不合时宜了，但是这样做也有不少好处，毕竟这让我从开始就走了正路，懂得学医的艰苦和做人的难处，无论当医生还是做人交朋友都有很多益处的。”

自身的聪慧敏悟，刻苦求学，再加上父亲的严格教育，郭可明边学习边临床，进步很快。从15岁到20岁，他学习了大量的中医经典著作，有非常扎实的基本功，对多种疾病有了初步认识，郭家独有的用药诀窍和父亲的临床经验也已基本掌握，在人们心中慢慢有了一定的威信，在十里八乡也小有名气，马上可以出师了。郭可明20岁那年他父亲不幸去世，他只好一人支撑起父亲留下来的门诊，自此正式悬壶于杏林，开始了辉煌并富有传奇色彩的行医生涯。

三世沧桑碧云堂 一代名医竞峥嵘

碧云堂是郭氏中医世家最初的字号。当初，碧云堂曾是石门的一块中医金字招牌，提起它就像提起北京的同仁堂，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尤其对于病患者来说，碧云堂几乎就是痊愈的希望，每日求医问药者众多。

“碧云堂”的字号是怎么来的呢？它又经历过怎样的沧桑？

碧云堂是郭氏第一代创始人，郭可明的祖父郭辰魁创立的。郭辰魁在东仰陵行医之始就为自己的门诊命名“碧云堂”。据说这个名字起得很有讲究：碧者，清也，玉也，温润醇厚，清澈见底，一碧万顷，比喻医生必须持有的职业道德，也用来预示医者做人的准则；云者，喻为高洁轻盈，洁白无瑕，天高云淡，生机勃勃。

初期的碧云堂只是个规模不大的小诊所，但药物齐备，治疗常见病多发病的中药基本上齐全，附近的乡亲们看病的确方便了很多。

碧云堂在东仰陵村开得很红火，可怎么又搬到石门了呢？它又是怎样慢慢发展起来以至于后来在石门名声大噪的呢？这还要从碧云堂的四次搬迁说起。

第一次：“被迫”迁出东仰陵。之所以说是“被迫”，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原来那时候老百姓的日子很苦，穷得连糊口都很艰难，又怎么能看得起病呢？郭辰魁眼看着乡里乡亲的有病不敢看于心不忍，于是他经常给乡亲们赊医赊药，乡亲们欠下的医药费能免的他都给免了。可是开诊所也需要本钱，郭家的家底也很微薄，时间一长诊所自然也就维持不下去了。就在碧云堂快要倒闭的时候，多亏本家的一个亲戚慷慨解囊，帮助他把诊所迁出东仰陵，在郅马村重新开业，这才使得碧云堂保留下来，郭家也才能继续了行医的生涯。

第二次：为报恩迁至黄庄。郭可明的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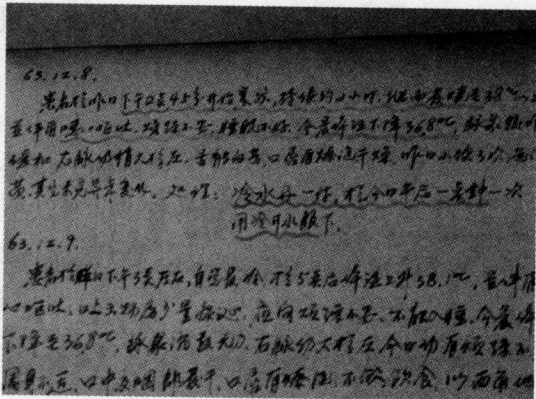


民国时期的行医执照

郭达谐继承了郭家的医术继续行医。他除了精通内科外又自学了中医外科，尤其是用蜀漆治疗老鼠疮（淋巴结核）堪称一绝，很多人都远道前来求治。其中有一位藁城县（今藁城市）黄庄来的病人是当地的富绅，他非常感激郭大夫治好了他的病。这位富绅看到村里人得了病，因缺药少医，得不到医治。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想让郭大夫给他的村里人看病的想法，给郭达谐提了个建议：“请郭大夫把诊所搬到我们黄庄吧，我们那里得这种病的人挺多，您的医术这么好，到了我们村肯定有用武之地。”开始，郭达谐并不愿意搬家，经过这位富绅的再三劝说：“您是好大夫，人品好，医术又高，我很敬佩您。您放心，所有的费用我来承担，保证新的诊所比您现在的更好更大。只要您同意就行！”郭达谐推托不过就答应了。于是碧云堂便从正定县搬到了藁城县，并在黄庄扩大了规模，有了更大的影响。

第三次：迁回东仰陵。郭达谐去世后，郭可明还是选择回到东仰陵村继续行医。于是又把碧云堂迁回了老家。

第四次：迁至石家庄。随着郭可明的威望越来越高，找他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不乏从石门去的“城里人”，有很多还成了郭可明的好朋友。每逢闲暇无事大家坐在一起聊天，这些朋友们都鼓励郭可明应该将碧云堂搬到石门去。那时的石门虽然还是个规模很小的城市，但由于地处交通要道，所以已经初现繁华，搬到石门对郭可明和碧云堂今后的发展都会有好处，大家看病也方便些。可是郭可明不想离开乡亲们，所以开始并没有答应。1936年，他的一位朋友背着他在石门的电报局街（现在的胜利南街一带）替他租好了房子，并且置办了开诊所所需的一切家具物件。看到木已成舟，郭可明这才正式将碧云堂迁至石门。那一年郭可明34岁。碧云堂乔迁石门也成为郭可明事业的一个新的起点。



郭可明手记——病案记录

经过一番艰苦的打拼，郭可明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在石门站稳了脚跟，碧云堂也越办越红火，声名远扬，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诊所门面增至九间，慢慢从相对偏僻的电报局街搬到了市中心的鲜鱼市街（现在新华集贸市场一带）。碧云堂在石门脱颖而出达到了鼎盛时期，当时的碧云堂就是一块金字招牌，成为当时石门中医诊所的佼佼者。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党号召民族工商业进行资本改造，开展公私合营运动。郭可明虽然是无党派人士，但是他看到共产党是一心为穷苦百姓、一心为大众的政党，是新中国的希望，所以他拥护共产党，发自内心地自觉接受资本改造。当时石家庄市卫生局准备筹建石家庄联合中医院（市人民医院前身），他不计个人得失，捐出碧云堂，作为股份加入联合中医院，亲自担任医务主任，在新医院的建立中承担了大量的具体工作。自此，郭氏三代人传承的碧云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以新的面貌融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

伸大义虎口拔牙 救同胞转危为安

就在碧云堂搬到石门的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日本鬼子打进华北，占领了石门。日本鬼子所到之处烧杀掠抢，日本人的残暴激起了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尤其是党领导的地下工作者更是给了鬼子沉重的打击，所以小鬼子对共产党是又恨又怕，到处抓捕“八路”。日本鬼子非常凶残，一旦他们抓到“共产党”就全部送到石门的“南兵营”，即电影里说的“宪兵队”在那里严刑拷打，直至折磨致残致死。所有进了“南兵营”的人就好比羊入虎口，凶多吉少，很少能活着出来，很多地下共产党员遭到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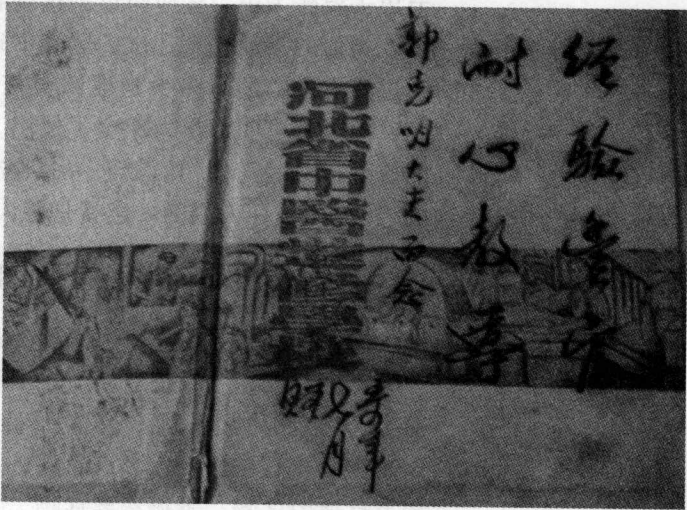
1937年的一天，东仰陵村的郭凤山和小西丈村的张曙光两名共产党员被鬼子抓进了南兵营。情况很危急，必须尽快想办法营救他们。当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人把他们给保出来。可是这有相当的危险性，就好比虎口拔牙，一旦鬼子发现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那这个做保人的处境就很不妙了。谁肯冒着生命危险替他们做保呢？有人想到了郭可明大夫。郭可明是东仰陵村人，在石门又有一

定的名望，如果郭大夫肯做保说不定还有希望。但是郭大夫肯冒这个险么？

大伙儿找到了郭可明。郭可明问明情况后当即表态：都是乡亲，只要有用我一定尽力。其实大家不知道，就在日本鬼子占领石门不久，郭可明的岳父就在老家被小鬼子用刺刀挑死了。郭可明心中充满了对日本人的仇恨，无论出于民族大义还是家仇国恨，这个忙都是一定要帮的。他的想法就是：抗日的力量那么宝贵，能救一个就要救一个。

恰巧，就在不久前郭可明刚刚给宪兵队长崔子训看好病，于是他就想利用这层关系营救两名党员。他找到崔子训，佯说道：“崔队长，听说你抓了两个人，一个是东仰陵的，一个是小西丈的。”崔子训说：“不错，有这么回事。”郭可明又说道：“唉呀崔队长，这恐怕是误会吧。这都是咱们本土的乡亲，怎么会是八路呢？您可一定要搞清楚呀。这十里八乡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要是闹出误会来大家不好看哪。”崔子训问道：“那郭大夫的意思呢？”郭可明连忙说：“您看，要是我给他们做个保，能不能请队长手下留情，先把他们放出来呢？”崔子训见到是郭大夫前来做保，碍于面子只好答应。很快郭凤山和张曙光被放了出来。后来党的地下组织曾经托人给郭可明送过钱以示感谢，但是被郭可明拒绝了，他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这钱我不能收，你们留着能干更大的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还没来得及休养生息，解放战争又打响了。黎明前最黑暗，1946年，石门国民党对共产党员进行大搜捕，并在石门设立了一个机构，老百姓俗称“十九号”，其实就是残酷的



郭可明笔记本扉页

特务机关。这里关押着很多共产党员，特务对他们施以酷刑，很多党员最后都被秘密处决。

由于郭可明为人正直，处事正义，所以被选为当时的石门医士公会会长。许多地下党员在他的碧云堂出出入入，安国的王节礼、李星垣等人就经常以看病为名住在他家，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一天，石门另一家药店同和裕的经理李占鳌和店里的六个伙计突然被特务送进了“十九号”，理由是他们都是地下党。郭可明以会长的身份连夜找到当时“十九号”的头头，再次做保要求把七个人保释出来。可这次“十九号”的头头并没有痛快地答应，他说：“这几个人的案子比较棘手，你郭大夫来做保，如果人跑了怎么办？”郭可明当即回答：“既然我敢担保，他们跑了当然找我了，我是跑不了的。”那头头看郭可明说得这么笃定，还真的把七个人给放了。李占鳌等人出来后马上离开了同和裕。没过几天，“十九号”的特务找到碧云堂，把郭可明“请”到了“十九号”。特务对郭可明严加盘问：“你身为保人就要知道保人的责任。现在你保的七个人全跑了，怎么办？”郭可明答应马上去找。郭可明回家后马上联系朋友，通知李占鳌等人回来。后来李等人从安国回来，以春节出去要账为由，才应付过去这场麻烦。

类似的事情还有几次，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是共产党员，有多少是进步人士，还有多少是被“冤枉”的老百姓，也许谁也说不清楚，但是郭可明都尽力保全了他们。郭可明冒这些险并未取过分文的好处，只因为他相信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心中有个最朴素的想法：“被坏人恨的一定就是好人，好人就应该救。”

全心全意为病患 医德医风树典范

怎样才能当一个合格的医生？是不是会看病就是好医生呢？

郭家祖传三条家训有明确的训诫：作为医生，不得嫌贫爱富，对穷苦患者要施舍药品；作为医生，不得贪图安逸，严冬降雪、风雨来袭之夜有求医者，多有急病，不可怠慢；作为医生，不可对病患言己所爱之物，不得索要钱物。一百多年来，这三条戒律始终是郭家严守的家规，凡是行医者，无论天资颖钝，必先学三条戒律，

熟记于心，心领神会，并要恪守终生。凡违背家训者，无论医术高低，亦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医生。在郭氏中医世家，看中的不仅仅是高超的专业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有高尚的医德。为医者，必先树医德，先学做人而后再行医。

郭可明一生谨遵家训，在50多年行医生涯中，始终保持着全心全意为病患着想，对病人“见彼苦恼，若己有之，一心赴救”的态度，树立了高尚的医德风尚，成为后世的典范。

郭可明曾经给他的孩子和徒弟们举过这样的例子：出门看病的时候，好比说假如有两种不同的车来接，一种是牛车，又笨又慢，另一种是“细车”，又轻巧又舒服，那一定要先问清楚是谁先来，谁后到的。出诊的时候必须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看完一家再看一家。千万不能看着“细车”好，心里喜欢，就嫌弃牛车。看病嫌贫爱富是不道德的。

有时候，他到比较贫苦的人家出诊，看完病家属为了表示感谢总要给大夫煮一碗挂面卧鸡蛋。那时老家都是土炕，用柴火烧锅做饭，柴火灰经常会落在锅里的挂面上。郭可明从没嫌弃过不干净，而是欣然接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病人和家属都安心。

解放前人民生活没有保障，再加上连年的战乱，老百姓生活困苦，乞丐特别多，郭可明经常给乞丐们舍药舍饭，从不厌烦。那时，很多乞丐都生脓腿疮，长期得不到救治，疮口破溃腐烂，脓水直流，看着恶心，尤其到了盛夏时节，远远的就能闻到一股一股恶臭，路人见到都掩口捂鼻，赶紧躲开，避之惟恐不及。可是，就是这样的乞丐如果走到碧云堂门前，郭可明看到了都会主动把他们叫进来，亲自给他们把疮口清洗干净，再用祖传治脓疮的特效药膏涂上，包扎好；如果赶上吃饭的时间还要留他们在药铺吃饭。乞丐们临走的时候，很多都给郭可明下跪磕头，感谢郭大夫待他们如同再生父母一般。

郭可明行医，最看重的是药品的货真价实。其实，这里面有两层意思：第一是说必须选用地道药材，对药品质量要求很高，绝对不能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第二是说，用药要替病人着想，在疗效相近的情况下，能用便宜的药就绝不用贵重药，这样做是为了替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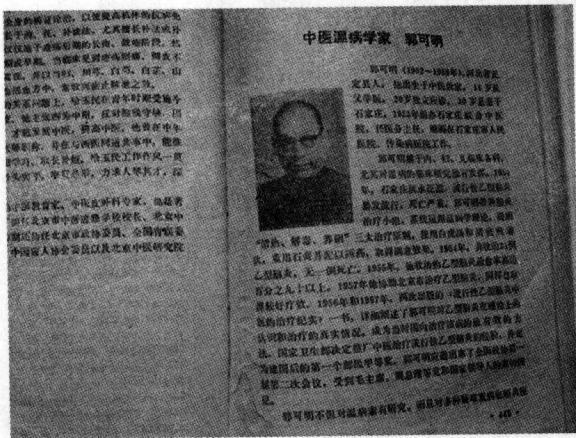
人节省金钱,为的是让更多的人敢看病,看得起病。

郭可明有一位朋友,是一家瓷器店的老板,家里很富裕。有一年他患上了比较严重的冠心病,心绞痛时常发作,非常痛苦害怕。为了看好冠心病他跑过很多大医院,钱花了不少但心绞痛就是控制不住,最后他找到郭可明求助。郭可明问明病情后,对他说:“这病能治,但是你要好好吃药,按时服用,静心调养,会好起来的。”然后只开了一味药,并让药房给他磨成散剂,嘱咐他每日一包,饭后温水送下。这位老板去拿药时,药房告诉他每包药两分钱。他听了既不敢相信,又有点不情愿:“我花了那么多钱都没治好的病,这么便宜的药就能治好啦?这能行吗?再说我这么大的老板吃这么便宜的药,是不是太跌份了?传出去不让人笑话吗?”但是转念又一想:“这药既然是郭大夫开的,又是我来求的郭大夫,那还是试试吧。”结果吃了没有半个月,心绞痛就彻底消失了,又服用一个多月,冠心病的其他表现也都大有好转。后来他把当时的想法讲给郭可明听,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通过这件事,这位朋友更加佩服郭可明的医术和人品了。

郭可明看病很少开大方,一般一服药不超过8味,他说:“药味少不等于不治病,用药的关键在精而不在多。尽量不要增加病人

负担。药价低廉也不等于不治病,便宜又能治大病,这才是医生的本事。”郭可明自己创立了一个方子,叫“消水丹”,专治肝硬化腹水有奇效,服药几天后,腹胀如鼓的病人也能够很快把水消下去。很多病人慕名从很远的地方来求医,可等他们拿到药时才发现,就是这么神奇的“消水丹”才仅仅花费每天两角钱,还赶不上他们来时的路费。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石家庄联合中医院成立后,郭可明又接受



《中国当代医学荟萃》中收录的郭可明传记

了“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以白求恩为榜样，对工作更加认真负责，对病人更加热忱。郭可明每年都要到敬老院为老弱孤寡治病，从未收取过费用。在年过六旬时，他还带头下乡巡回医疗，为乡亲们送去高超的医术，解除他们的病痛。乡亲们听说郭大夫来了，都争相来看病。郭可明一人每天就要承担近 120 人次的治疗任务，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往往是眼睛熬得通红，人也累瘦了，但他却毫无怨言。

郭可明毕生的心血都用在中医事业上。他想的是病人，琢磨的是治病救人的方法，连平时聊天都是在谈论某种疑难病症该怎么诊治。

郭可明一生行医始终保持着高尚的德操，不求名利，不受诱惑，心中只有病人，他以实际行动履行了“大医精诚”的诺言。郭可明的高尚医德医风感动过无数病人和家属，他的超凡人格魅力和道德情操值得后世子孙永远学习。

石膏大王治乙脑 降伏瘟神立大德

河北省地处滹沱河流域，历年水灾严重。1954 年刚刚入夏，石家庄就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暴雨。大暴雨接连下了整整 7 天 7 夜，致使石家庄石宁堤决口和河流水位猛涨。6 月 11 日，石宁堤决口，洪水奔涌而来，迅速淹没了这个城市。当时石家庄的平均水深有 1 米多，城里的许多道路，房屋、工厂、学校，都被浸泡在水中，而大桥街、民族街和南马路一带是石家庄地势最低洼的地区，这里的洪水最深达到一人多高。石家庄几乎家家户户都受灾，形势非常严峻。

半个多月洪水退去后，蚊子滋生，各种传染病传播蔓延开来。“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终于流行性乙型脑炎暴发了。

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最早是 1953 年由日本的科学家最先发现的。乙脑病情往往比较急重，病人出现持续 39 摄氏度以上高烧不退，剧烈头痛不止，紧接着神志不清，出现抽搐，如果再不能控制就会陷入昏迷，危及生命。也有些病人虽然没有死，可是却留下了后遗症，变得呆呆傻傻，甚至丧失生活能力。

1954年的乙脑来势异常凶猛，患者死亡率极高，达到了50%，可以说比2003年流行的SARS还要厉害得多！它给人民的生命造成了很大威胁。

石家庄市卫生局紧急组织医务力量全力以赴应对乙脑。当时的卫生局局长袁以群召集以郭可明为首的7位石家庄著名老中医到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投入乙脑的临床治疗工作。面对疯狂的乙脑病毒，面对被病毒痛苦折磨的病人及家属，面对领导深切期望的眼神，郭可明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一场抗击乙脑的战役即将打响。

可以说，在当时乙脑治疗是世界性的医学难题，中国也并没有成熟的中医治疗乙脑的方药，只有山东济南市有过用安宫牛黄丸治疗的个案。那该怎么办呢？难道要对这个疯狂的病毒缴械投降吗？当然不会！郭可明查阅了几乎所有的中医典籍及相关资料，中国的，外国的，从明清朝医案，到宋金的经典，然后又回过头来研究祖传的方剂，再根据临床观察的病情仔细研究分析，静下心来冥思苦想。

通过研究和分析，郭可明对乙脑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他确信来势汹汹的乙脑，其病机就是外感毒邪，暑病与瘟疫并至，燥热伤阴，所以要制伏乙脑，必须采用“清热、解毒、养阴”的方法。这个观点6个字，是郭可明的技术和观念的创新，后来被归入国家治疗乙型脑炎的医药经典和教科书，直至现在还被称为中医治疗乙型脑炎三原则。

病因病机搞清楚，治疗方案也就出来了。郭可明擅长治疗多种疑难病症，尤其擅长治疗温热病，使用生石膏堪称一绝，人送绰号“石膏大王”，所以他提出了以“白虎汤和清瘟败毒饮”为主方，重用石膏的治疗方案，另外还要根据病人的体质和病况适度调整药剂，进行辨证加减。这个方案收到了极好的效果。治愈率达到了100%。石家庄经郭可明治疗的确诊病例34人，无一人死亡，且均没有后遗症。这创造了当时治疗乙脑的奇迹！

救治乙脑患者期间，郭可明和其他专家一道吃住在病房，昼夜守护在病人身旁，时年52岁的老专家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抢救急重患者他都跑在前面，病情危急的时候一个病人一天要开三次